

纪念黄宗英 1925.7.13-2020.12.14

即使生命会像闪电般消逝 我也将永远留下形象、文字和事业



▲黄宗英与赵丹等
▲黄宗英出演话剧《甜姐儿》

2020年12月14日凌晨3时28分,文化老人黄宗英去世,享年95岁。

从戏剧到电影再到文学,黄宗英的一生恰如她自己说的:只做别人无法代替你做的事,少做或不做人人都能做的事。

她曾经说过——

我从不说晚年和余年,即使生命会像闪电般消逝,我也将永远地在世上留下形象、文字和事业。

演员-作家-经理,经理-作家-演员,让生命的底片三次曝光、再三次曝光,可能吗?只能由未来的实践来回答。回答我的朋友,回答我的社会主义祖国,回答抚养培养了我的人民和时代。



▲晚年的黄宗英

朋友黄宗英

她总是不断把惊奇放在人们面前

李辉

第一次见到黄宗英,是1993年她与冯亦代先生北京结婚时。在此之前,与冯亦代熟悉的朋友们,都为他们两位的“黄昏恋”感到高兴。在迎娶黄宗英之前,冯亦代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每次去看他,他都情不自禁地要谈到黄宗英。待确定下婚期,他又多次与我商量婚礼宴请之事。后来,受黄宗英委托,整理他们之间的情书时,我才发现,细心而兴奋的冯亦代,早在信中向黄宗英通报了他的京城朋友的情况。

他们的婚礼安排在三味书屋举行,参加者达一百余人,一时成为京城文化界盛事。就是在那次聚会中,我们夫妇与他们二位合影留念,这也是我们最早的结识。

老人们的再婚曾有失败的先例,但黄宗英与冯亦代建立在纯爱基础上的黄昏恋,却以《纯爱》一书,留下了佳话。现在看来,黄宗英与冯亦代的黄昏之恋的确是难得地和谐和圆满。难以想象,如果没有黄宗英的细心照料和精神支撑,冯亦代能否从一次又一次的重病中挺过来?如果细读《纯爱》,就不难发现,正是她的聪颖、好学,孕育了两个老人美丽的黄昏恋。冯亦代传书,演绎出的是一场动人的、纯真而炽烈的爱情。

冯亦代1996年脑血栓中风,一度失

语,记忆也严重衰退。从那时起,帮助冯亦代恢复说话和写字,是黄宗英的主要任务。“我演员出身,还不会教二哥发声?”七十几岁了,她执意搬到病房,用毛笔把拼音字母抄在大纸上,让冯亦代每天从最基本的发音开始练。她让我买来写字板和粗笔,让冯亦代练习写字,从笔画开始。“难我不倒”——她用毛笔写得大大的四个字,挂在他面前。冯亦代坐在轮椅上,呆滞地看着大字,黄宗英扶着他的手,一笔一笔上下左右写着。写累了,又小孩一样开始嘟囔学语。她“啊”一声,他也“啊”一声;她“呀”一声,他也“呀”一声。这一幕,让人感动也心酸。

两个月后,冯亦代挺过了那一次大病,恢复说话和写字。再过几个月,居然还写出了新的情书,写出了书评和散文。朋友们都说这是奇迹。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奇迹的身后,站着的是黄宗英。

2004年6月,黄宗英前往上海治病,我陪她到医院探望冯亦代。冯亦代已经住院一年多,多次报病危又多次挺过,但生命显然已慢慢走向终点。冯亦代躺在床上,眼睛瞪得很大,但已认不出我来者何人。她似乎预感到这将是最后的见面。她紧紧握着他的手,默默地握着,好久,好久。半年多之

后,冯亦代于2005年2月元宵节那天告别人世。11天后,黄宗英在上海的病房里,给远去的冯亦代又写了一封信,向二哥报告他们的情书即将结集出版的消息,写得凄婉而动人:

亦代二哥亲爱的:

你自二月二十三日永别了纷扰的尘世已经十一天,想来你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你是否依然眷顾着我是怎么生活着吗?今天是惊喜,毫无意外地惊了我。我重新要求自己回到正常生活……亲爱的,我们将在印刷机、装订机、封包机里,在爱我们的读者群中、亲友们面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你高兴吗?吻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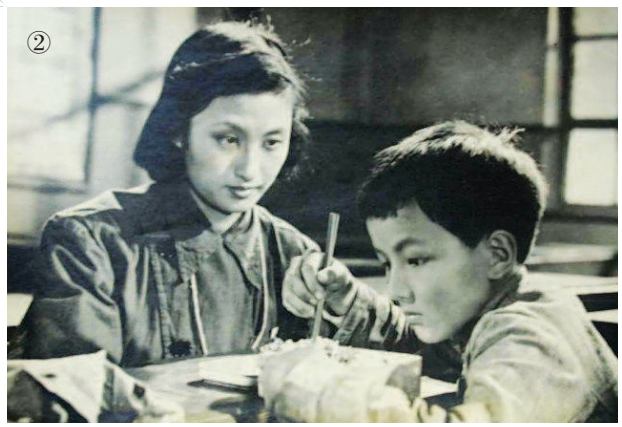
愈加爱你的小妹
二〇〇五年三月五日

她说,这是最后一次给他写信。我为这封信起了个标题:《写给天上的二哥》,将之作为《纯爱》的序言。

一晃十多年过去,黄宗英一直住在医院治疗。她所爱过的、熟悉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她而去,她所钟爱的写作,也难以再如从前那样全身心投入。

黄宗英文学艺术年表 (部分)

- 1941年,出演话剧《蜕变》(甜姐儿)
- 1946年,创作散文随笔《寒窗走笔》
- 1947年,出演电影《追》(幸福狂想曲)
- 1948年,出演电影《街头巷尾》(鸡鸣早看天)
- 1949年,出演电影《迎春春》(丽人行)(乌鸦与麻雀)
- 1953年,出演电影《为孩子们祝福》
- 1954年,创作电影剧本《平凡的事业》
- 1956年,出演电影《家》
- 1959年,出演电影《聂耳》
- 1978年,报告文学《美丽的眼睛》发表,作品获得1977-1980年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 1979年,报告文学《大雁情》发表,作品获得1977-1980年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 1982年,出演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报告文学《桔》发表,作品获得1981-1982年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 1984年,报告文学《小木屋》出版
- 2016年,《黄宗英文集》出版



①黄宗英在电影《家》中饰演梅表姐

②黄宗英主演的电影《为孩子们祝福》

③黄宗英与赵丹在电影《幸福狂想曲》中擦出爱的火花

演员黄宗英

在密密的“书林”里,到处有她的宿营地

饶曙光

12月14日凌晨,95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作家黄宗英走完了她的艺术人生。“从小我没想当演员却当了演员,没想到当作家却当了作家。”回顾黄宗英与艺术结缘的一生,她的舞台,她的银幕,她的文学,都与书密不可分。正如她自己所说,“在那密密的书林里,到处有我的宿营地……”

因为成名作《甜姐儿》,黄宗英总被人们亲切地唤作“甜姐儿”,但她身上其实是知性多于“甜”的。应该说,就颜值和知名度而言,黄宗英并不及当年万众追捧的上官云珠,以及后来的王丹凤、张瑞芳。但她的表演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和感染力,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诸多影片中,黄宗英往往不是那个一开始就能吸引眼球“女一号”,她不抢眼,不出风头,也不“虚张声势”;但随着剧情的推进,你很难忽略

她的存在。虽然表演风格内敛含蓄,但黄宗英对角色的理解和对细节的把握,却能赋予剧中人物更丰富的情感,使角色充满张力和感染力,让人在回味中感受到表演尤其是人物塑造的“言有尽而意无穷”。

在黄宗英的诸多艺术作品中,笔者独爱开拍于新中国成立前、完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乌鸦与麻雀》。黄宗英在其中扮演一名国民党小官僚的情妇,时而妩媚轻浮,时而凶神恶煞,含蓄里蕴藏着张力,内敛中自有一股爆发力蓄势待发——这与她之前的银幕形象反差极大,不凡演技的背后,是对角色的沉淀,和对人性的感悟。在《幸福狂想曲》《丽人行》《街头巷尾》《家》《聂耳》《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等影片中,黄宗英都为观众塑造出了栩栩如生的银幕形象,成为了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光彩篇章,而且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示出独具一格的银幕魅力,日久弥新。

在那篇流传甚广的《我公然老啦》一文中,黄宗英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既十分温暖又很不合常情的社会心理氛围的压力:不允许、不承认曾经是妙龄女演员的我们老了。这怎么可能?!”今天再看这句话,仍然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作为一名女演员,她有着独特的内在气质,这同她对阅读的热爱密不可分,“在那密密的书林里,到处有我的宿营地”。即便是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书依然占据了她的绝大部分。阅读培养了她对文学的情感,赋予她对事物、对人性、对历史、对世界的深刻认知——呈现在文字上是随性、自然的美;表现在银幕上是内敛、含蓄的力;作用于人生,是赵丹的“慧眼识人”。黄宗英在上映于1947

黄宗英自述

为了“小木屋的梦”

一九七九年秋天,我以记者身份去四川成都参加“全国生态会议”。一位戴着小白遮阳帽长得像带学生去野外考察的援藏女教师——徐凤翔,激情地讲述她想要在西藏建立一座“生态定位观察站”——哪怕只建一座小木屋。她说对西藏地区的发展如何重要,对地球同一纬度线、对全球生态协调如何重要。当时乃至现在我都觉得不一定有人等着她的考察成果去实施规划,但我立刻被她的“如何重要”迷住了。可能由于血缘遗传因子的作用,我从小向往把自己和“如何重要”的事业联系起来;否则就总为闹不清自己为什么

活着发愁,或为“接错了线”苦恼。我一生迷恋知道天高地厚而怕地厚天高的性格。于是在嘉陵江畔,我对徐凤翔说去西藏找她。她不信,也不在乎,我却上了心,直到一九八二年秋天,我随作家代表团去西藏,在藏南藏北转了一遭,当次日将飞返内地时,我才在一个小旅社的客房里,在汉族的、藏族的,烧饭的、补鞋的,采购的、探亲的一群人中找到徐凤翔,她正闪着大眼睛向大伙讲保护森林。我立即退掉极难买到的机票,随徐凤翔坐在大卡车的前座上进了藏东南森林,与当地驻军派给我们的藏族副连长白玛一起,天天为徐凤翔和她的

考察小队在帐篷外敲冰举火烧水做饭,亲眼目睹她每天每天披星戴月早出夜归,数树叶、称树根、查年轮……西藏土地面积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等于十二个浙江省或两个法国,真不知她这行业要做到何年何月才算个段落。我决定在稿纸上先为她搭一座小木屋——一九八三年植树节前后,我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定稿。此文结语是:

我们——一个一个、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知识的苦力,智慧的信徒,科学与文化的“朝拜者”;啊,我们也是一步一长跪地在险路上

住院期间,黄宗英每天在背诗词——就像前些年在北京学英语、学中药一样。她还坚持写日记,写长短不一的随笔,并把这些短文命名为“百衲衣”。对于她,阅读与写作是永远的爱,永远的伴侣。

黄宗英总是不断地把惊奇放在人们面前。她是影星,但把耀眼的明星看得很淡,反而更看重文学创作。从1950年代初她就以写作为主了,从诗歌、剧本、报告文学到散文,她是成功地从演艺界转向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她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她写赵丹、上官云珠等亲友的回忆文章,她的电视节目《望长城》《小木屋》等,堪称力作。

在许多同辈人眼里,黄宗英是一个聪颖过人的才女。在我眼里,她则更是一个对知识永远充满好奇的人。每次见到她,她总是在阅读。年过八十后,她每日仍在读书,在写日记。她告诉我,每天早上,她要听半个小时的英语教学广播。“我知道学不会了。我把它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执著与坚毅,令人感叹不已。

从舞台、银幕走到文学领域的她,其实一直生活在为自己设计好的场景中。这是想象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努力。回忆与梦想,务实与浪漫,沉思与激情,无法严格而清晰地予以分别。它们早已构成了她的生命的全部内容。悠悠一生,如同一幕又一幕的戏剧。她是编剧,是导演,也是演员。生活其中,陶醉其中,感悟其中。她的生命列车,就是沿着这样的轨迹一直前行,直到停在95岁五个月过完的这一天……

(作者为知名作家,《黄宗英文集》整理者)

年的影片《幸福狂想曲》中出演女主角,与年长她十岁的赵丹擦出爱情的火花。黄宗英的含蓄、内敛和赵丹的张力、爆发力在表演中互补,也同在生活中相吸。

黄宗英不仅以出色的银幕形象长留在观众心中,还以她隽永的文字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早在1946年,才20出头的黄宗英就在《文汇报》上连载了散文随笔《寒窗走笔》。上世纪50年代之后,作为演员的她渐渐淡出,作为作家的她却如鱼得水,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另一片天地。她深入藏地,亲身体验1800多公里的险路,写成《小木屋》;她挺进罗布泊,跋涉于漫漫戈壁,主持《望长城》。这样的沉淀,这样的坚守,从银幕一路走到了文坛。

在黄宗英看来,为了演好一个角色,哪怕不是主角,案头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在银幕上塑造的一系列栩栩如生、富有内涵的艺术形象,她对于电影表演事业的热爱和在角色塑造上付诸的努力,都为中国电影人树立了榜样。无论角色大小,无论戏份多少,黄宗英始终用心、用情地塑造着每一个银幕形象。这份对电影事业的情感和敬爱,值得每一位中国电影人追随。

(作者为电影理论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走着。您是怎样的遭遇,我们甘心情愿、情愿甘心。

一九八四年五月,为了“小木屋的梦”——为了在藏东南建一座高原森林生态定位观测站,我随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摄制组再度进藏。高原并不可怕。许多队员甚至毫无异样感觉。但毕竟那里的氧气只是内地的三分之一;我们就愈加尊敬六次进藏,深入密林险境考察的徐凤翔。

电视片《小木屋》以我的报告文学为线索,摄制组没有剧本,我们实地拍摄生态学专家徐凤翔和她的伙伴们的森林考察工作。我个人的任务只是让自己忘掉自己曾是个演员,让植物学家们忘掉摄影机,使屏幕上出现森林考察生活的真实情景。《小木屋》将是我第一部电视报告文学片。一年以后,电视片中小木屋的图形成为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的前区的象征建筑。(摘编整理自《黄宗英自述》)